

# 第 1 页

---

## 第一章

### 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地区的孩子，后来怎么会成为一个懂得中美两大文化的外交官呢？

#### 童年在山西

1929年7月30日清晨，我出生于山西太原。山西地处我国华北地区西部，整个山西省大部分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着的山地型高原，海拔在1000米以上。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黄河就经过山西省，总流程965公里，因此我经常很骄傲地对旁人说，我是来自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山西。我父亲冀贡泉、母亲张陶然都是山西人。父亲在娶我母亲以前，曾有过两次丧妻之痛，所以我父亲和我母亲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很大。他们结婚时，母亲年方二八，而父亲已近不惑之年。据说我母亲为此在结婚之前还曾有过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来被她家人以三国时刘备染胡须和孙权的妹妹成亲的故事说服。父亲的第一位妻子生了大哥朝鼎和二哥朝彝后去世了，第二位妻子生了大姐慧青后又去世了；我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位妻子，生有三子一女，即三哥朝辅、四哥朝理、我和小妹妹青。

我父亲是汾阳建昌村人。汾阳自然资源丰富，是汾酒的产地，

## 第 2 页

---

也是山西省的棉花和粮食的生产基地之一，因为地处汾河之阳（西）故得此名。建昌村里明代建筑“文峰塔”是有名的文物古迹。父亲从小学习成绩优秀，1904 年被山西大学堂录取，1905 年被官府送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学习法律。他在日本共 7 年，因为在班上名列前茅小有名气。1912 年，当局因辛亥革命停发留日官费，父亲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资助而中断学习回国。回国后曾在教育部工作，趁公务之便，在日本又把明治大学法律系的课程学完，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后来他被山西军阀阎锡山聘为法律顾问，并历任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民国初期父亲冀贡泉同祖父冀玉清、祖母、继母、大哥朝燕，二哥朝霖、大姐慧青等在山西汾阳县建昌村祖父家

父亲的性格极为仁慈。当官不久，他买了一支猎枪，拿着它打猎。但第一次打猎，打死了一只鸟。他为这只可怜小鸟的死去而伤心了很久。这之后就把猎枪扔了，再也不用。而且这一辈子也

## 第 3 页

---

没再打过猎。

父亲慈悲为怀的性格大概是从祖父那里遗传来的。祖父是汾阳建昌村的地主荒年时他不但不催租逼债，反而开仓赈济穷人在数十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三哥被遣送还乡意外地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照顾，大概就因为我祖父的乐善好施所致。这是后话。

父亲也极富正义感，但同时胆子又比较小。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保皇党和革命党都要拉他加入，父亲说：“参加保皇党呢，怕丢脸，参加革命党呢，怕丢脑袋。”所以他两个党都不参与。父亲虽然胆小，但还是跟左派作家鲁迅交了朋友，二人后来成为莫逆之交。鲁迅日记中就有七处提及父亲。我小时候，父亲也曾一再对我们提起他同鲁迅交往的事。可惜我那时太小，对他同鲁迅的交往没有太深的了解，只是有这样一个印象，父亲同鲁迅是好朋友，二人经常来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当时父亲在山西任司法厅长，因为不满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父亲解散了司法厅，转到山西大学任法律系教授。1930年，父亲作为阎锡山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汪精卫、冯玉祥等反蒋国民党人的会议。他们试图通过制定宪法来抗拒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的企图。他们的努力失败了。父亲认识到，没有坚强的政治基础，而只通过草拟一纸空文就想改变政治现实，那才是“最愚蠢不过的”。那时，通过我大哥朝鼎，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已有所了解。从那以后，父亲更加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阎锡山说服父亲重返省政府任教育厅长，父亲在他的岗位上多次保护了太原成城中学校长刘曷如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生都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阎锡山命令父亲镇压学生，父亲于是用卡车强行把游行学生拉到郊外，然后劝说他们以后别闹事了，就把他们放了。但学生们并没

## 第 4 页

---

有听他的劝告，被释放以后继续游行请愿。阎锡山于是坚持要父亲调动武力向学生开枪，这时父亲拒绝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他辞去官职，回到汾阳老家，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山西的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是天下最娇生惯养的孩子，因为我在兄弟里排行最末，而且身体最弱，所以最受父母宠爱。有一次上体育课，我差点儿在操场上晕倒。我当时利用长辈对我的溺爱，经常撒娇哭闹，每次哭闹都使我大获全胜。长辈完全满足我的欲望，而惹我发脾气的人必然倒霉。那时我们家的仆人很多，专门照顾我的仆人名叫福海。他心地善良，性情柔和，对我百依百顺。我虽然体弱多病，但性情顽劣，充满好奇心。我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骑在福海的背上在太原城墙上跑来跑去假装自己是抗拒从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的大将军。

当时父母对我百依百顺，我爱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但那时我只爱吃纯白面做的面条，什么蔬菜、水果都不吃，肉类也基本不吃，最多吃一点“绵肉”，即肥猪肉，或一两丝瘦猪肉。另外在六七岁前还每天喝一杯羊奶那时我们家养了一只母羊。由于蔬菜水果基本不吃，蛋白质食物吃得也很少，所以我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身体就更弱了。

父亲把家迁回汾阳后，还是全县最有威望、最有地位的绅士，他的孩子们也顺理成章地进了全县最好的学校。父亲那时还有一把手枪，这就是他权势的象征。1939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很快就推进到汾阳附近。那时虽然汾阳没有中国驻军，日军仍然对汾阳县城进行轰炸。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全家趴在坑边的情景，以及外面炸弹降落时的呼啸声和炸弹爆炸的巨响。幸好炸弹并没有落到我家附近。随着战事的吃紧，人们开始大批逃离县城。我们学校怕学生都逃光了于是宣布逃离者一律开除，永远不准回校。我四哥和我都很怕被开除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父母父母都

## 第 5 页

---

没有反应。但是第二天，我们全家就坐上了最后一辆卡车离开汾阳。父亲深知自己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小有名气，日本人来后一定会找他做事。他不愿当汉奸所以赶快带着一家人逃往汉口。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等到 35 年以后我才又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去山西帮助清理“反革命”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后话。

出了汾阳以后，我们在黄土高原的小路上，时而坐骡子拉的轿车，时而步行有时还停下来躲日本飞机，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走到黄河在西南转弯的地方，也就是晋、陕、豫三省的交界处。我们坐一艘平底木船过黄河到潼关下船，过潼关时父亲出示通行证后，交出了手枪。母亲告诉我们，父亲不再是在山西时那样的有权势的人了，我们以后言行都要格外小心。

父亲本来已决定到邻近的陕北参加一年前刚完成长征的红军，但后来因得知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朝鼎要在次年（1938 年）从美国回国，于是决定先到汉口等大哥。我们在 1937 年夏末乘火车到达汉口。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当地入学。一进校门，我马上就意识到情况和在老家时大不一样，到学校时，并没有老师笑脸相迎。我走进教室到书桌后坐下，也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不过班上的小霸王很快就决定要教训我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厉害。下课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把拳头在我鼻子前晃来晃去。幸而他穿的裤子太大了，他必须不断地用两只手提裤子以防裤子掉下来，这就给了我逃跑的机会。

我们到汉口后几个月，南京就陷落了。我们听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杀害，无数中国妇女被强奸后又被刺刀刺死。对于日本军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那时，日本飞机又加紧了对汉口的轰炸，但因为我们在法国租界，日本当时同法国尚未开战法国租界就等于于是法国的领

## 第 6 页

---

土，因此相对来讲还算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站在房屋外面的马路上看日本飞机轰炸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还击，忽然听到一阵欢呼，我们赶快抬头看，原来一架日本鬼子的飞机被打中了，冒着黑烟掉了下来，我们也都跟着欢呼起来。

祖父也跟着我们一起从汾阳到了汉口，没过几个月，他就以 84 岁高龄因病去世了。父亲后来告诉我说，祖父一生住在山西乡下无法适应汉口法租界的生活方式，饮食也不习惯，所以一到汉口就感到身体不适。我想祖父去世虽然和水土不服有关，但主要还是老人眼看自己的家园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老百姓惨遭不幸，生灵涂炭，忧国忧民而死。祖父去世后，许多权贵到我们家吊唁，这说明父亲当时在汉口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南京陷落后，汉口是临时首都。有几个官员告诉父亲说，蒋委员长想请他做司法部副部长，但父亲拒绝了。大概父亲那时已经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气愤。

此后不久，我大哥朝鼎就回国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朝鼎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比我大 26 岁。他和我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在家时，他同母亲常常在一起庆祝生日。我出生前几年大哥就离家了。朝鼎 13 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 岁就和同学一起提倡新文化运动，16 岁时，他积极地参加了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他在 1924 年去美国深造以前，还同当时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有过一次长谈。李大钊非常鼓励他去美国学习，要他多学习对建设新中国有用的知识。后来朝鼎在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于 1927 年在比利时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哥在美国读书时，原来学习法律，入党后，改学经济。他曾接受党的任务到莫斯科，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周恩来当英语翻译，所以周恩来很早就对朝鼎非常了解。朝鼎那时已经同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结婚，并有了孩子。她是朝鼎在去欧洲参加反帝大会时在船上认识的，名叫海莉，生长在纽约。她的父母都是

## 第 7 页

---

### 东欧移民

大哥这次回国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当时我对大哥最深的印象，是他使我头一次尝到了冰激凌和黄油，这两样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最爱吃的（笑：当然我现在知道年纪大了不应该吃太多脂肪）。

我还记得大哥那时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跟父亲谈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和父亲主要是谈去延安根据地的事情。

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朝鼎把我带到长江边上。我看见一架水上飞机停在码头上，他和飞机驾驶员咕嘟了一阵，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同驾驶员讲的是英语。几天以后，全家就把行李收拾好，坐上水上飞机飞往重庆。飞行的路上飞行员告诉我们有几架日本飞机尾随我们，我们赶紧在长江上降落，我们都跑到岸上，藏在一个坟地的灌木丛中，我们在坟墓旁平平地躺下，一直躺到日本飞机飞走了，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然后才起飞，这样就安全地飞到了重庆。

一到重庆，父亲和大哥就着手具体准备去延安，而且开始安排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见面。可惜大哥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做手术，所以我们就误了去延安的车队。而且需要等很久，才会再有一次去延安的机会。如果我们单独去延安，就会特别危险。这时候呢，周恩来就找父亲和大哥谈话，向他们提出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全家都去美国。当时周恩来就预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在美国工作，做加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许会对中国革命更有用。而且我们也可以在美国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当时我们家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条件，就是朝鼎对美国相当了解，他的英文非常好；父亲对日本相当了解，日文非常好，而且英文也不错。那时汉口也被日军攻占，重庆变成了战时首都。父亲认识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多教育和法律部门的高级官员，所以他那时给我们一家都办护照还是比较

## 第 8 页

---

容易的。他去美国的表面理由是去研究西方法律。

一切都安排好后，父母、大哥朝鼎、四哥朝理、我及小妹妹青就动身去美国。家人还有在北平读书的三哥朝辅已结婚的大姐慧青，以及在绥远念大学的二哥朝彝未能同行。

我们先从重庆乘飞机到昆明。这是我第二次坐飞机，但还是很高兴。和上次从汉口飞到重庆不同的是，这一次飞行不是太稳定因为飞机很小，又要经过很多山岭，所以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我玩得很高兴，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因为那时飞机上还没有安全带。可是我母亲、四哥朝理和小妹妹青都晕飞机，所以他们感觉很不好。然后我们坐汽车、火车和轮船从昆明、西贡到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坐英国船横渡印度洋和地中海到法国马赛，走了大约一个月。最后再由法国的一个海口城市 Cherbourg 远渡大西洋到纽约。父亲、大哥和我一路上都过得很高兴，因为我们在船上吃了很多好吃的，喝了很多汽水，天天像过节。可是母亲、四哥和小妹妹都晕船，因此过得很不愉快。

在巴黎我们住了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全家在巴黎有两大发现，一个是法国饭，尤其是法国的美味羊角面包（邓小平同志也很爱吃），还有法国的巧克力特别特别好吃；还有一个发现是巴黎的女士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个个都漂亮得不得了，但等她们到了 35 岁后就会发胖，当然也就不漂亮了。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强，对新的奇特的东西直有很强的求知欲，这种好奇心一直跟随了我这一辈子。巴黎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奇异的世界。我那时才 9 岁，刚从中国偏远的内地来，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西方世界。有一天，我们全家散步的时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缭乱，我是左看右看看不够，把其他的都忘了。看了一会儿后就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陌生人，而我家人却找不到了。我发现我走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放声大哭，可是马上就意识到，

## 第 9 页

---

在国外全家最重要的人是我大哥，所以我就拼命大声喊叫“大哥”，我大哥当时已经是很紧张地在找他的小弟弟，一听到我叫就赶紧跑过来把我找到，这样大家才放心。

1939年2月2日，我们的船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哈得逊港，大嫂海莉带着孩子来接我们。我还记得大哥非常高兴地挥手大叫他的大儿子的英文名字——埃米勒！埃米勒！这一天就是我在美国+一年半的生活的开始。这十一年半中我小学毕了业，又上了中学，还上了两年大学。

现在回想起来去美国的这段往事，我有时还非常感慨。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改变和决定的。如果当时我大哥没有生病，我跟着父母和大哥去了延安而不是美国，我如今很可能就是延安的“三八”式老革命、老干部了。

### 在美国上小学和中学



少年时代的冀朝铸（后排右三）和美国纽约城乡学校的同学们合影

## 第 10 页

---

我们到美国后，父亲和朝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同朝鼎的两位朋友、中共地下党员徐永瑛和唐明照在唐人街创建了《华侨日报》社，由父亲担任总编辑，徐、唐二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旁协助。创建这份报的主旨就是号召海外的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并且同美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抵抗日本的侵略。该报一直延续至今，报道来自中国的消息现在叫《侨报》。

我父亲在《华侨日报》的收入很微薄，每月还不到 100 美元。来美国前一路逃难颠沛流离，随身带的钱财也都花光了。大哥朝鼎在美国有工作，收入不错，但他也要养家，无法给我们太多帮助。所以我们只能在纽约曼哈顿东城下区的贫民窟租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每月房租 35 美元，剩下用来买食物的钱和其他方面的消费就很少了。两年后，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需要熟悉亚洲、特别是熟悉中国和日本情况的专家，我父亲应聘到美国政府战争情报署太平洋司任助理编辑。这项工作的收入当然要比原来的高得多，因此我们得以有能力搬到一处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在第十街的第一和第二马路之间，但仍未离开东城下区贫民窟。

来美国前，我从没想到会住进这样的贫民窟里。我们的新家在一个非常破的公寓里，公寓有 6 层楼高，我们住在最顶层。顺着又黑、又脏、又潮湿的楼梯爬上去，走进房间，发现连空气都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家具都是又旧又破的，墙上的白灰也脱落了，蟑螂满地爬。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呀，美国真穷啊。”可是后来很快就意识到，实际上穷的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这个家。

在汉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不再会有人像以前那么照顾我，也不会有人像以前那么怕我了。在中国时，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而且我周围的人好像也很尊敬父亲，等我大哥到的时候，周围的人也很尊敬大哥。我们到了美国后，住进了美国纽约的贫民窟，这不

## 第 11 页

---

可避免地使我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另一方面我也更加感觉到我们家有什么东西是和别人不一样的，特别是父亲和大哥。当时有几个中国和美国的非常亲密的朋友，对我父兄特别尊重。随着我对这个情况认识越来越清楚，我下定决心，我作为冀家最小的儿子和最娇惯的孩子，将来也要变成一个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人。但我也意识到，这个特殊的成就不会有什么人为我恭恭敬敬地端上来，而需要我通过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取得。

我们到纽约后，因为大哥的关系我和妹妹考到了一个进步的私立小学上学，它名叫城乡小学，位于纽约曼哈顿市的格林威治村。这个学校给了我妹妹全额奖学金。

当时中国正在八年抗战，广大的美国人民非常同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对中国人很友好。我上学的第一天，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午饭时，专门为我搞到一些米饭，还有肉和蔬菜。但我一看见米饭，马上就大发脾气而且用中文大喊：“我们有文化的北方人从来不吃米饭，只有没文化的广东人，才吃米饭！我们有文化的北方人，只吃像面条、馒头一样的面食。美国老师和同学听不懂我说什么，但他们看出来我很讨厌米饭就很快把米饭拿走了，而给我吃土豆、肉和蔬菜。这是我在学校里惟一一次发脾气，这以后我跟所有同学关系都非常好。后来我学会了吃米饭。我的许多好朋友都是南方人，爱吃米饭。我的妻子汪向同在上海长大也爱吃米饭。

我初到时，语言不通。学校为我专门派了图书馆员，每天都教我一点英文，这样我很快就能和大家交谈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一生的工作，主要是靠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即做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或作为外交官讲话，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别人一直认为我的表达能力是我最大的优点。但实际上，作为一个靠说话来做工作的人，我讲话从来就不是特别清楚的，好像舌头特别大，不灵活。我最好的美国朋友之一尼克·伍德就说我讲起话来就像“土豆糊”。

## 第 12 页

---

一样。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好莱坞邀请我父亲在他们正在拍摄的一个关于杜立特将军轰炸东京的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最初是要我父亲在一部叫作《紫心勋章》的影片中扮演一个出类隐藏在中国农村中的美国飞行员的中国汉奸。我父亲极为愤怒，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们又要我父亲在另一部名叫《在东京上空三十秒钟》的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次是扮演一位受人尊敬、慈悲为怀的华人医生，他挽救了一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生命。我父亲高兴地接受了。数十年后，当我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时，我的美国朋友们送给我这部影片的录像。

我自小就对很多不同的事物感兴趣，从宇宙的起源到生命的起源以至于人类的未来等等。当我还是学龄前儿童，在太原的城墙上骑在我那忠实的仆人的背上，设想我自己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将军，讨伐从北方来的匈奴时，我就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了。我进入城乡学校以后，学到有关中世纪的武士们身穿光彩夺目的盔甲，头戴闪闪发光的铜盔进行战斗。自那时起，我就一直渴望着能穿这样的盔甲。数十年后，当我作为驻英大使访问德国时，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参观一座德国宫殿时，戴上了这样的头盔拍了一张像。

最令我神往的就是史前动物。我从老师那里得知在一亿多年前，恐龙在地球上游荡。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恐龙在 6500 万年前从地球上消失了（那时是 30 年代后期人们还未做出现在的科学论断，现在则认为是一颗巨大的陨星撞击在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半岛，它产生的高温在全球引发了一场大火，浓烟笼罩整个地球，所有大的动物和多数植物都被消灭）。我对这些故事极感兴趣很想到博物馆去看一下，如果看不到实物，能看到它们的化石也好。

1939 年夏，当我 10 岁的时候，机会来了。主要不是看化石，

## 第 13 页

---

因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也能看到化石。这次是看真恐龙的复制品。世界博览会在纽约的法拉盛开幕，他们有一个厅专门是展出恐龙和其他史前生物的。朝鼎带全家去看世界博览会，它的主要建筑是一个方尖塔楼和一个大球，由一座桥将二者连接在一起。在大球里可以看到一个未来的城市。我当然对此极感兴趣，但我真正想看的还是恐龙展览。我家里人则对此毫无兴趣，我那时已比我八九个月前在巴黎走失的时候勇敢多了，此外，我已经学会了用足够的英语来问路。我决定一个人去看恐龙，我口袋里还有一毛钱，刚好够我买票进去看恐龙。我偷偷地从我家人那里溜走直奔恐龙馆。我付了钱后就走进去了，我对自己说，先看完展览后再考虑如何回家的问题。

我完全被整个展览迷住了。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恐龙的复制品。有令人望而生畏的食肉恐龙，包括强大无比的霸王恐龙，它可以用它那像刀一般锋利的牙齿把一个食草恐龙撕成两半。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巨型食草恐龙，它从头到尾尖共 30 多米长。当它就餐的时候可以把整个大树连根拔起。我还看到可以飞的爬虫类的复制品。还有各种恐龙的化石展品和图画的说明。

我随后又去看早期人类的展览，从 100 多万年前直立爪哇人直到 50 多万年前北京猿人。然后在 25 万年前又出现从欧洲来的尼安德特人。在 10 万年前，欧洲又出现了克罗马尼翁人，从他们大脑的容量和体形来说，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现代人。那个展览说明人类如何在 100 万年前在南亚从猿进化到人，并经过数十万年向北转移发展为北京猿人，然后转到欧洲成为尼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为现代的克罗马尼翁人。经过几十年的新发现，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最新科学论断则与上述当时的说法很不一样。现在普遍认为爪哇人和北京猿人在大约 50 万年前同时存在，而且都属于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大概是人类发展中脱离正道的独特人种，由于无法同自非洲移到欧洲而且更能够适应环境的智

## 第 14 页

---

人竞争（克罗马尼翁人就是智人的一种）因而在不到 10 万年前就绝种了。但是再往下，人们的看法就开始分歧了。通过仔细研究古化石细胞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线粒体，今天西方大体一致的看法是，当代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来自东南非洲大裂谷的一个母猿人。不但尼安得特尔人绝种了，爪哇人和北京猿人也绝种了。这一观点遭到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包括西方的个别古人类学家的强烈反对、他们同意说尼安得特尔人大概是绝种了。但他们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一个夏娃的线粒体的后代。无论如何，20 世纪初期那种过分简单化的有关人类进化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随着现代科学方法的迅速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找到一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关于人类进化的科学论点。

当我满足了看古生物学展览的愿望之后，就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但我已经没有钱坐地铁。但我并没有像在巴黎时那样害怕我四周看了一下，看到一对善良的老年夫妇。我向他们走去请他们给我五分钱坐车回家。他们善意地微笑着给了我一毛钱要我快点回家找我爸妈去。

自 1939 年那次去世界博览会后，引发了我对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的兴趣，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对这门科学很感兴趣。另外，北京猿人同我似乎有着特别的缘分。1959 年初我曾被送到北京西南郊区房山县人民公社的顾册村生产队劳动。那里靠近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地周口店。我很高兴在一个离北京猿人被发现的洞穴不远的公社劳动，等我妻子向同来看我时，我们就一起去看了那些洞穴。

20 世纪 20 年代中叶考古学家在洞穴里发现了距今 50 万年前的猿人的头盖骨化石遗迹。当日军在北京郊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部分驻扎在那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把这些头盖骨碎片拿走了，以防它们落入日本人手中。但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后

## 第 15 页

---

杳无音讯，所以我们能找回来的只有几块骨头残骸。幸运的是，一些石膏模型是按照原来的头盖骨做成的，所以我们还能看见它们原始的样子。

我第三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和北京猿人发生关系又是在美国。那是 1973 年我在驻美联络处时。我到达华盛顿不久就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女人打来的。她说有一个知道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下落的人想在纽约帝国大厦屋顶见我，和我讨论把北京猿人头盖骨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我向黄镇大使汇报了这件事，他也认为这个电话非常奇怪。我们向外交部汇报后，外交部同意我们的看法，即我不应该单独到帝国大厦屋顶去见那个神秘的人。直至今今天，北京猿人头盖骨依然下落不明。

业余爱好以外，父亲和大哥对我在美国的生活影响很大。在纽约上小学时，我经常听到父亲和大哥在卧房谈话。通过听他们谈话，我认识到他们也是什么都要争第一，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即使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也不因为困难而气馁。作为强者，在困难面前，他的决心会变得更大，他只会不断地努力，直到成功。

父亲和大哥的一切努力用两条红线贯穿起来，就是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认为生命是神圣的不管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他们在争取第一的过程中都是非常地爱惜生命，非常讲人道主义。父亲和大哥仁慈的性格可以有许多例子来说明：比如说父亲自从打死一只鸟后拒绝打猎，他当年在阎锡山手下任教育厅长时宁可辞职也不愿奉命向学生开枪；又譬如父亲在北京时在门上专门开了一个小洞，这样外面一只野猫就随时可以进来吃东西。他在门里放了一个小盘子，专门给猫留着食物。父亲看见地上爬着蚂蚁时，他宁可绕道走也不愿踩这些蚂蚁。

除了从家里学到很强的人道主义外，我还从我的家庭学到很强的爱国主义感情，学到了以作中国人为荣。我在家里跟父亲谈

## 第 16 页

---

过无数次话，每一次父亲都说，人的一生如要获得成功，应该不断向上，争第一。他多次对我说，人要有较大的作为，必须力争在自己本行争当第一。虽然当第二或第三也不错，但远不如当第一。他说，人生就像一只蚂蚁爬楼梯，如果你爬一半就停止努力，那你只能掉下来，只有当你努力爬到顶点，才会一帆风顺。但争第一的目的是为祖国争光。父亲也很现实，他知道我不一定都能争到第一，所以他经常补充说虽然你很努力，但实际上并不会永远能得第一，但在争取第一的时候，一个人至少应为祖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差不多每次他和我谈我这一辈子的计划，最后都迟早会把内容转到我怎么样为祖国服务这个话题上来。所以我一生都一直以作中国人为荣，虽然我一生中在思考问题时，多半还都是用英文。

我爱祖国、爱祖国人民的感情除了因为同父亲谈话之外，还由于我经常看一些书籍。我很喜欢看历史书。在我了解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之后，我对祖国的爱就更加强烈了。对祖国深切的热爱和一个强烈的为祖国服务的欲望超过了对个人得失的考虑。也就是这样深厚的感情，使得父亲、大哥和我最后信仰了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而对对我们来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体现他像一个巨人屹立在其他各位中共领导人之中。他的名字“恩来”二字就是“与恩俱来”的意思。

除了父亲对我的教导我自己争第一的努力也帮助我培养起很强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这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最好的人一定要有正义感，而且也要很讲人道主义。譬如我看见地上有蚂蚁在爬时我也一定像先父那样绕开走，而不会踩死他们。当我知道残酷的日本和德国法西斯主义者侵略、屠杀无辜的人民，我甚至想早日参加空军，这样好和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战斗。

我也受了西方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很强的影响。我小时候爱上了一个同学、一个性格非常善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叫做安妮·黑

## 第 17 页

尔·考丁。安妮的父亲是美国海军中校，也是美国建国时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后代。内森·黑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后，宁死不屈，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他临上绞架前的名言是：“我惟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国家。”她父亲是一位思想非常保守的海军军官，因此对于他女儿同中国孩子交朋友很不以为然。但是安妮不顾家庭的反对一直同我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有一次，我乘长途汽车去她家的乡村别墅，汽车是半夜到。我要她去车站接我。她那时年纪大小还不够开车的年龄，因此，只好求她母亲开车同她一起去接我。我爱上她是上小学时，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后，就分手了。那时我觉得自己对她的感情就像意大利中世纪大作家但丁描述的对碧瑞丝的感情一样。但是，所有这些很强的感情都没有在个人生活中彻底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在后来一个很强的信仰，就是我相信集体行动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和中华民族。



1990 年在好友安妮家中和小学好朋友们合影 右二彼得，右三皮埃尔 左二安妮 左一彼得太太莉